

历史有无用之用，有大用

——访李学勤教授

○ 学生记者 刘力耘



李学勤等研究竹简

为更深入地了解这批弥足珍贵的清华简，记者专门采访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负责人李学勤教授（以下简称“李”）。李教授深入浅出地为我们分析了清华简的意义和价值，并对史学研究和中國史學界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记者：李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清华简的年代已经被确定为战国中晚期，作为先秦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您脑海中的先秦是什么样的？

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不过作为多年做这方面研究的人，我心目中古史的形象也在不断的变化，有时候一个新的发现就会改变我们一些很基本的看法。比如说西周土地制度，过去很多学者讲当时土地都是国有的，所谓“田里不鬻”，土地是不允许卖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现在我们通过阅读金文（按：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发现那里面是有土地买卖的记载的，而且有以贝币计算的价格，这这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如何，以我的经验和体会，被证明的结论越来越接近文献的记载，我们以前对文献不太认可不太相信，现在看来，文献反而更可信一点。

记者：综合这些林林总总并不断更新的认识，先秦给您一个总的印象是什么？有什么特殊的时代精神？

李：先秦这个概念包括的时间太长了，文明之前的暂且不说，文明诞生之后，比如《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五帝的时候，当然记载中神话传说的东西就多了点，可是那个时候的历史还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材料太少。夏之后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当然东周开始就又是另一个样子。你说“先秦”，从文明之后算起也有几千年的延续，不是铁板一块，变化很大。其中比如春秋时就很流行一种价值观念——“义”，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有点像欧洲的骑士精神。比方说宋襄公打仗，对手楚国的军队正在渡河，有人就建议宋襄公趁着对手渡河进攻，一下子就能把对方打败，宋襄公不同意，认为这是“不义”，历史上管这叫“宋襄公之仁”。可是这是非常符合当时价值观的，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这类观念就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体系，即后来的儒学。儒学不是一位学者发明的，它是从夏商周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积淀形成的。

记者：这可以反映三代古史在整个中国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了。

李：对，前面暂且不讲，从商周开始吧，是中国文明的萌芽、扩大时期。特别是周，是中国历史的经典时期，所谓经典时期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后来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就是西方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但是“轴心时代”的理论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强调文明的形成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孕育过程，只注意其短暂的烂漫期。西方也是这样，比如《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可是近来通过对《死海文书》（Dead Sea Scrolls）和其他材料的研究看到，其实《圣经》中的很多东西可以追溯到近东更早的时代。

记者：我们经常说历史像长河，这个比喻好像暗示不可割裂开来看历史。

李：是这样的，比如说儒学，事实上孔子是集大成者，集大成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最后一站，另一方面，他又开启了以后的时代。有些人为了神话孔子，特别是像康有为这样的今文学家，讲孔子之前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

记者：孔子自己不是讲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么？

李：是啊，其实孔子就是继承了延续千年的文化，后来的诸子百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解释，所以儒家和其他各家不能完全平等。我说这话，不是说其他各家不好，没有价值判断，只是陈述事实。

记者：说到儒学，您赞成“儒教”的说法吗？

李：我不赞成，因为儒学不符合一般宗教的标准，比如说通常理解宗教都是有神论者，但儒学就不讲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它是很理性的一种思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宗教观念特别弱，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国教，佛教最盛的时候它也不是国教。还有宋明理学，它甚至是反对佛教的，反对有神论的，比如程颐，看到偶像崇拜他都不理，甚至要毁弃。这就是儒学奠定的一个文化传统。现在人们很多的宗教信仰都是混合的，为了解决问题，找神帮忙，哪教的神都拜，为的还是有求必应，很实用主义的。其实，什么都信，也就是什么都不信，这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

记者：我们知道清华简已经鉴定为战国中晚期的文物，那么战国时期的儒学在清华简中又是如何反映的呢？

李：我们这批简涉及的内容，都是当时的经典，这个和以往出现的上博简、郭店简不同，上博简和郭店简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而清华简都是当时的经典，主要是《尚书》。《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啊，秦始皇焚书后散佚，后来有凭学者回忆留下的今文《尚书》，也有出土的古文《尚书》，后世有今古文《尚书》之争，有伪古文《尚书》之论，等等。而清华简中的《尚

书》是秦火之前的，更接近真实的版本，这对于史学界，特别是上古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记者：以您的了解，您认为当代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如何？

李：据我的了解，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史学研究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说的史学，是指从梁启超开始的“新史学”。所谓“新史学”，它一方面接受西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它继续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有它自己基本的精神。要知道，中国是古代世界里最讲历史、拥有最详细的历史记录的民族。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史官，而史官有一种记载事实的精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君的典故就体现了一种社会精神；比如《史记》，把开国皇帝刘邦写得有些无赖，有一种历史记载的正义感传统在里面，也是符合儒学传统的。当然中国史书里那些秽史、歪曲的地方也很多，可是那些都是要受到批判的。

在西学方面，中国近代最早接触西方史学是通过维新比较早的日本，而通过日本接触到的主要是德国的史学，即兰克史学，这一派的特点是陈述事实，所以和中国传统史学有契合点。也正因为如此，它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很大。其后，从西方兴起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史学理论，唯物史观，这对后来的中国史学影响也很大。纵观中国史学的历程，两个因素会对其产生大的影响，一个是新材料，一个是新理论，二者缺一不可。近现代的一些著名的史学家，都是在这两方面下功夫的，比如说王国维注重新材料，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记者：感觉我们当代的史学研究现状是，新



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即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材料有（比如清华简等这些出土文献），对新材料的研究也有，但是好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

李：对，问题就在这儿，怎么通过对材料的研究和整合来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这是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究竟怎么发展？这就是问题。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说明的，现在的史学界，就像其它学科一样，有着严密的分工，不要说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上古史，三千年左右，没有哪位学者一个人可以覆盖这一时期所有的史学领域。比如我们做古文字的，以后没有真正的古文字学家，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研究古文字的各个方面。现在分工越来越细化了，比如我们这个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我们请了一些专家，老中青都有，有的人专做材料的工作，清华简是战国中期到晚期的楚国文字，这已经够一个人做一辈子了。

但是从另一个高度来看，文字整理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齿轮，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重要作用的齿轮不一样。我认为，清华简的发现很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历史上孔壁藏书和汲冢古书相提并论，在世界历史上，可以和《死海文书》同日而语。这不是我们自己夸耀，我们的工作可能完成得并不好，但是这批材料本身是很宝贵的。而对于清华简来讲，文字的识读工作就是目前那个重要的齿轮，它会引来一系列重要的改变，所以这个工作很重要。

记者：说到重要性，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甚至怀疑整个史学研究，发问这有什么“用”？就像一些学者提出的，历史记忆在今天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历史记忆本身正在被贬值，被无意义化。既然历史记忆的存在与否都变得无所谓了，那么史学研究似乎更是多此一举了？

李：对，这就是所谓的史学危机。我们先说学历史有什么用，实际上历史有无用之用，有大用。问题在于这个“用”，不应该简单的是物质甚至是金钱的功能，如果能跳出这个圈子，那么这问题就好解决了。因为人类的需要和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多方面的，除了物质生产，人类还有精神的需求。如果只重视物质生产而排斥其它

方面，是极其危险的。梁启超写《欧游心影录》时，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也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认为这样，全世界不少的志士仁人都有类似的看法。人本身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所以我们要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史。

记者：我们知道，这是您一直以来强调的，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要多一份温情，要去理解和解释，要怀有更多的尊重。我们知道您有一本名为《走出疑古时代》的书，那您怎么看待疑古这个问题呢？

李：《走出疑古时代》这本书是很早以前我在北大做的一个演讲集册出版时，取了这么个抢眼的名字。“走出疑古时代”是我说过的，但不是我努力提倡的一个说法，我也不见得非这么说不行。因为其实所谓“疑古时代”，最早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序》中提出“信古一疑古一释古”三段论说。所谓疑古派，主要是过去单纯的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看待古史，而且是从辨伪书入手，以书辨史，始终没有跳出这个圈。王国维先生就不同意这个看法，他的学生在回忆录里写道，王先生讲他们破坏太多了，要更多地从正面来看待。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从名字来讲就是和古史辨是对立的，要证，不光证真，也证伪。王先生使用的二重证据法超出了当时单纯辨古书的思潮。

当然古史记载中会混有一些神话传说的色彩，越往前可能越多，比如记载说伏羲女娲是蛇身之类的，这个当然不能信，但是这也代表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时代。还有一个问题，历史记载并不完全等同于神话传说，你不能说看什么都是假的，都是后来人编出来骗我们的。而且通过我们的研究，包括与出土文献的印证，大部分都不是伪的，我们的工作分辨其中真实的因素，这才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的释古。西方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荷马史诗》里面神的活动比人的活动都多，当然不可信，但是不能说因此特洛伊战争不存在，因为这一点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了。古史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东西，是被一代代人当作最宝贵的东西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要走出疑古时代，从方法论上来讲，就是要跳出由辨古书到辨古史，要结合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和方法，多学科地研究历史，那自然，清华简在其中也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